

浙江民间收藏精品走进博物馆系列特展

百硯千姿

Ink Stones in Thousands of Postures

杭州古越会馆藏古硯精粹

浙江省博物館 編



文物出版社

浙江民间收藏精品走进博物馆系列

百硯千姿

杭州古越会馆藏古硯精粹

Ink Stones in Thousands of Postures

Gems of Ancient Ink Stones Collected by Hall of
Ancient Yue, Hangzhou

浙江省博物館 編



文物出版社

封面题签：刘新园

摄影：宋朝 高玲

责任印制：张丽

责任编辑：贾东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百砚千姿：杭州古越会馆藏古砚精粹 / 浙江省博物馆编. —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10
ISBN 978-7-5010-3836-7

I. ①百… II. ①浙… III. ①古砚—中国—图集
IV. ① K875.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25489号

百砚千姿·杭州古越会馆藏古砚精粹

浙江省博物馆 编

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直门内北小街2号楼 邮政编码 100007）

<http://www.wenwu.com>

E-mail: web@wenwu.com

北京图文天地制版印刷有限公司印制

新华书店经销

635×965 1/8 印张：40

2013年10月第1版 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10-3836-7

定价：320.00元

浙江民间收藏精品走进博物馆系列特展（特集）编审委员会

主任：陈 浩

编委：王 炬 王屹峰 许洪流 陈 浩 陈 平 李 刚 沈军甫

沈琼华 杨 铿 郑幼明 范佩玲 钟凤文 赵幼强 梅丛笑

雍泰岳 蔡小辉 黎毓馨

策 划：陈 平 王 炬

执行策划：钟凤文

浙江民间收藏精品走进博物馆系列特展之九

百砚千姿·杭州古越会馆藏古砚精粹

主办单位：浙江省文物局

承办单位：浙江省博物馆

协办单位：杭州古越会馆

展览时间：2013年10月31日～2014年2月28日

展览地点：浙江省博物馆 孤山馆区

展览策划：陈 平 钟凤文 方肖鸣

展品选审：柴眩华 周 刃 钟凤文 方肖鸣

内容设计：钟凤文 方肖鸣

形式设计：王 炬 李卫平 钟凤文

特集撰文：钟凤文 方肖鸣

英文翻译：徐雪英

序

三

砚，文房四宝之一，但最早使用砚台的并不是断文识字的文人，而是绘制彩陶的工匠。考古证明新石器时代已用打制细磨的石研盘和石棒碾磨红或黑的颜料，将陶器绘制得绚丽多彩。这些与天地同寿的石头制成的研盘，是为最早之砚，也是文房四宝中最为耐久者，得以流传百世，成为中华文明的见证。当以笔书写替代刀刻铜铸文字时，砚因其“润彼元墨，染此柔翰；神情写意，经纬群言”而成为文人一生相伴的挚友，封之为“即墨侯”，并随着时代的更迭而丰富发展，蔚为颇具特色的文化现象。

文人与砚朝夕相处，咫尺距离，不免触景生情，咏怀感叹，魏晋文人留下了多首咏砚的辞赋，不仅显现了砚台的文人情结，还为人们研究早期砚台保留了史料。文人（这里的文人包括因才学推荐为官和通过科举考试为官的各级官吏）也是砚台最大的消费群体，文人对砚的品质论形直接影响砚台的发展和美学风尚，他们的品砚心得是后人研究砚史的宝贵资料。砚为文人案头之物，既要适用，又要养眼，更要怡情、励志，因此，文人对砚要求质佳形美，往往亲力亲为地对砚的雕琢提出独特的要求，抒写非常时期的文人情怀，如反映文人处世哲学的北宋括囊砚和见证历史的双桃池砚。更有雕花琢纹、题名记事之砚，直接记录了与砚有关的事件和纪年，是研究砚史不可多得之物。砚的石材不同，纹理各异，有天然的物理之美；而形制更是千姿百态，各异其趣，有人为的艺术之美。一石一砚的连缀和铺垫造就了独具东方特色的、博大深厚的砚文化，寄托了历代文人的思想、情感，以及为人处世的理念。

古越会馆方肖鸣先生，雅好古玩，过手的古董不计其数，唯对古砚情有独钟，庋藏历代古砚六百多方，不仅贯穿两汉至民国各个时期，且形制各异，材质多样，特别是其宋砚收藏，形美质精，独步藏界。此番精选其藏砚一百五十余方，编撰成《百砚千姿》一书，纵横展现多姿多彩古砚文化，以飨古砚收藏爱好者。十月底，同名展览也将在浙江省博物馆孤山馆区精品馆展出，这是我馆“浙江民间收藏精品走进博物馆系列特展”之九，不仅展现了民间收藏的专业和精神，同时也丰富了博物馆的展示内容，相信一定会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

浙江省博物馆馆长 陈浩
2013年8月

Preface

Ink stone, one of the four treasures of the study, was first used by craftsmen painting the colored pottery wares rather than those men of letters. Archeological discoveries show that the craftsmen used finely chipped and polished stone plates and stone sticks to grind the red or black pigments and then painted the pottery pieces colorful. Those stone plates, the earliest ink stones in history, are the most enduring among the four treasures of the study, bearing witness to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When writing brushes began to take the place of sealed or copper-cast characters, the ink stones, due to their "accompaniment with ink and freedom to express ideas", are renowned as *Ji Mo Hou*, becoming the life-long close friends to the men of letters. The ink stones, changing and developing with the passage of times, are characterized as a cultural phenomenon.

With the close accompaniment of ink stones day and night, the men of letters recalled memories of the past; therefore, there left behind many poems eulogizing the ink stones, in particular, by those men of letters in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not only showing their complex, but giving us plenty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Those men of letters (including those officials promoted either for their talent or through imperial examinations) constitute the biggest group of consumers. Their appreciation of the quality and forms of ink stones, having a direct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and aesthetics of the ink stones, were the precious materials for the later generations to draw reference from. The ink stones, usually the objects on the desks of the men of letters, should be appropriate, pleasing to eyes and inspirational; therefore, having high expectations of the quality and form of the ink stones, the men of letters had unique requirements of the cut and polish of the ink stones and expressed their sentiments through ink stones, e.g. the *Kuo Nang* ink stones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reflecting their philosophy of life and the Twin Peach Pool ink stones bearing witness to history. In addition, some ink stones, carrying the carved patterns, inscriptions and relevant records and years, are invaluable objects for studying the history. The ink stones, with an integration of natural physical beauty due to different stones and textures and artificial artistic beauty due to various carved shapes, make up the profound ink stone culture with unique Oriental characters, expressing the thoughts, feelings and philosophy of life of the men of letters throughout ages.

Mr. Fang Xiaoming, owner of Hall of Ancient Yue, shows special preference to antiques, in particular to ancient ink stones. He owns more than 600 ink stones of different shapes and materials made from the Han Dynasty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 His collection of the ink stones, especially those of the Song Dynasty's, ranks top in the collection circle for the beautiful shapes and superior quality. Over 150 ink stones are selected into the book: *Ink Stones in Thousands of Postures*, demonstrating the multifarious ancient ink stone culture to satisfy the collectors of ink stones. An exhibition of the same name will be held in Hall of Gems, Gushan Branch, Zhejiang Provincial Museum at the end of October, which is the ninth "Exhibition of Zhejiang Folk Collection Gems Entering Museums", not only showing the expertise and profundity of folk collections, but enriching the display of museums. I am convinced it will be popular among the general public.

Chen Hao
Curator of Zhejiang Provincial Museum
August, 2013

百不見千姿

劉新園頌



刘新园先生题词

看古越会馆的古砚收藏

砚是古代文化人写字时不可或缺的研墨工具，被中国文化人使用了两千多年。近百年以来由于自来水笔与圆珠笔的流行以及化学墨汁的研制成功，砚的实用功能失去，它和中国文化人的关系渐渐疏远，从而退出了文化人的书案与办公桌。

尽管现代中国人很少或者不再使用砚台磨墨了，然而由于它陪伴从汉代至清末中国文化人有两千多年，两千年以来它和中国知识分子的距离仅仅只有40厘米，因而其材质的选择与造型的设计就必然凝结着不同时代的知识分子所不同的实用与审美要求，从这个角度来看，砚是古代社会精英阶层遗留下来的非常重要的文化遗物了。

杭州古越会馆，多年来关注古砚的收藏与研究，不数年竟在全国范围收集整理古砚数百种。从材质上看有：石砚、陶砚（包括澄泥砚）、瓷砚、漆砚、木砚、水晶、玉石、铜、银等。

从造型上看有：方、圆、八方、六方、随形、象生等各种式样。瓷砚中东晋越窑青瓷大砚，釉色精美，胎质细腻，显然是王羲之时代的书写者的日用之物。五代—北宋早期越窑青瓷刻水波纹圆砚，釉可称之为秘色，针刻纹饰流利生动极其精美，显然造自古越州的能工巧匠之手。宋景德镇窑云头形双池青白瓷刻花砚亦为仅见的稀有之物。

古越会馆的收藏品类虽然繁复，但仍以唐宋石砚为其重点。唐砚中的端石与虢州石箕形砚浑厚适用，宋水坑多眼与洮河砚其材质细腻发墨，是宋代文人的心爱之物。

而歙砚更为丰富，其中有名贵的细罗纹、眉纹以及枣心眉纹、算子眉纹等，最为引人注目的有南宋极其重视的刷丝罗纹砚，其纹理之美制作之精展示宋人高超的技艺与深厚的审美修养。一方海棠形小眉纹砚造型极雅，小巧精致，据说是某工人从凤凰山建筑工地拾得。如果传闻不误，当是南宋宫中极有文化的宫女们的用品。

明清时代亦有值得观赏的遗物，如白端、冰纹以及成队游鱼状青花的随形砚亦为古名坑的稀有之物。

从浙江省博物馆挑选出来的百余件展品来看，汉、唐重实用，宋人重石材之纹理，明清则重雕饰。观赏这些展品，使人产生久远的遐想，显然有助于探索不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们，在各历史时期形成的不同审美情趣与适用要求。

刘新园

2013年7月10日于观叶楼

杭州博物館多年來注重古硯的收藏與
研究，不數年，竟在全國範圍收集整
理古硯數百種。從材質上看有石、陶、漆、
木、水晶、玉、銅、銀硯等。

從造型上看有方圓、八方、方、隨形、象

生各式。從硯中東晉謝靈運青溪大硯，神
色精美，胎質細膩，墨乾如玉，藏之同竹
也。代人所書之物，五代——北宋早期硯案
青溪刻水波紋（圖硯），神為棕色針刻
收斂流利，生動極其精美，墨乾出白，藏案

明清時代每有值得觀賞的遺物，如白端
硯、以及隊形如魚、青花的蓮花硯，亦為
古硯中的稀有之物。

江浙省切硯，硯於造出其四而方
原品來看，唐重實用，宋人重石玩

之紋理，明清重雕飾，觀賞這些展
品，使人產生久遠的遐想，墨乾有助
揮毫，不同時代的知識份子，在為歷史
時期形成的不同的審美情趣與實用要求，

劉新園 二〇一三年七月十日

看世越金銀的古硯收藏

硯是古代文人學士的不可缺少的研墨工具。被中國人使用了几千年。近百年來由於自來水筆與圓珠筆的流行以及化學墨汁的研製成功硯的實用功能失

定和中國文人的關係漸趨疏遠。從而退出了文人的書案與辦公桌。

尽管中國人很少或者不再使用硯台。然而由於它伴隨着漢至清末中國文化人西行多年。兩千年以來定和中國知識份

子的距離僅有四十厘米。因而其材質的選擇與造型設計就必然凝結着不同時代的知識份子不同的實用與審美要求。從這個角度來看。硯是古代精英階層遺留下來的非常重要的文化遺物了。

能工巧匠之手。宋徽宗崇寧云其形如池。青白波刻花硯亦為他一年之印。稀有之物。

古越金銀的收藏品類雖然繁多。但仍以唐、宋、石硯為其重。唐硯中的

端石與號州石其形硯渾厚運用。朱冰坑多眼與冰河硯其功質細膩發墨。是宋代文人的心愛之物。

而歐硯更為年富。其中有名貴的細羅紋。兼心眉紋。柿子眉紋等。最為引

注目的有南宋人極其重視的刷絲羅紋。其紋理之美。製作之精展示宋人高超的技藝與深厚的審美修養。一方眉紋海棠形小硯。造型極雅。小巧精緻。據說是南宋宮中極有文化的宮女們的用品。

百砚千姿话砚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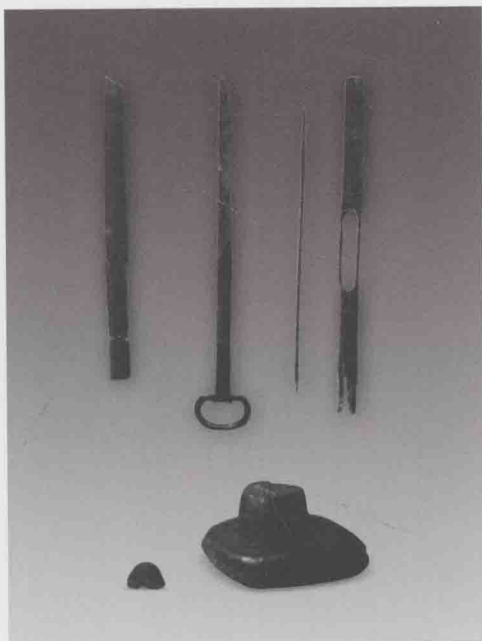
砚，因与文人关系密切，至少在宋代已有专门的研究著作了，如宋初苏易简的《文房四谱》，米芾的《砚史》，唐积的《歙州砚谱》等，但是这些论砚的著作按王冶秋先生的说法都“不能算作砚史”，实为砚谱。王冶秋先生在1963年底写的《刊登砚史资料说明》一文，根据实物简述了砚的发展概况，对研究砚史有着引领的作用。2012年出版的上海博物馆藏品研究大系《中国古砚》，华慈祥先生根据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古砚，结合考古发掘资料阐述了古砚的发展状况，内容翔实，但仅囿于上海博物馆藏砚。此番为了做“浙江民间收藏精品走进博物馆特展”系列，在杭州古越会馆拣选古砚，发现古砚的资料非常丰富，可串联起汉至清代各个历史时期。笔者结合考古资料、历代文献，对这些古砚进行了梳理，草成下文，以期揭示生产生活、政治哲学、审美时尚与砚台发展之关系，裨益于砚史研究。

一、肇始期——先秦时期

最早使用砚台的并不是断文识字的文人，而是绘制彩陶的工匠。史前考古证明新石器时代的齐家文化已用打制细磨的石研盘和石棒碾磨红或黑的颜料，将陶器绘制得绚丽多彩。所出土的石研盘上残留有赭色的粉末，还有用手扒过的痕迹，说明在使用上与砚还是有所区别，此时研盘的主要功能是将颜料碾成粉末，合上溶液搅拌使用是在其他器皿里完成的。《洛阳市十五年来出土的砚台》刊载有一件西周时期的“玉雕牛形调色器”（图一），其牛背上镂雕四个对称的小圆桶，内部有朱色残留物，此件调色器即是完成拌和的器具。石研盘在使用上与砚台一次性完成墨汁研磨略有不同，但无疑是砚的雏形。先秦时期中国的文字经历了甲骨文、钟鼎文、墨书的嬗变，甲骨文与金文在刻铸之前是否以朱、墨书写，有待于考古资料的进一步证实，但在竹木简上书写具有革命性的意义。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文化大发展的时期，诸子百家著书立说，推动了文字及文具向简便易用发展，书写比雕刻及铸造文字简便易行，文字的载体是价廉宜书的竹木简，且便于修改，毛笔的即蘸即写使得“研墨使和濡”的砚台也应运而生。此间的砚台与史前的研盘十分相似，1976年湖北云梦睡虎地十一号秦墓（墓葬时间为秦始皇三十年，即公元前217年，距秦称帝五年，基本反映战国时期状况。）出土了毛笔、笔套、铜削、木削、研磨石和石砚等一套文具（图二），其中石砚制作简单，以近似圆形的石块制成，惟精细程度超过史前研盘，砚面打磨平整，无聚墨的墨池或低洼处，这从出土的毛笔可以看出端倪，毛笔是宜于在竹木简上书写的、比较纤细的毛笔，所需墨汁很少，竹木简的吸水性也不如后来的纸张，因此，平整的砚



图一 玉雕牛形调色器



图二 睡虎地十一号秦墓出土文具

面足以保证书写之需。出土的研磨石与史前的碾磨棒却大异其趣，研磨石的磨面是平的，为了便于和平整的砚面碾磨墨丸，而碾磨棒的磨面是圆头的，可以将颜料碾压得更细。其后秦汉时期的石砚和研磨石虽然更为规整、美观，但功能性的东西基本没变。

二、嬗变期——秦汉六朝

秦汉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统一的封建帝国，在“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等一系列措施下，产生了著名的秦篆汉隶，这些文字都是写在竹木简上的，因此墨汁的用量都不大，砚面都是平整的。东汉时期出现了带耳杯形墨池的三足圆砚，是为最早的带墨池的砚台。

此间的砚台多为石砚，往往就地取材，并不讲究石质，注重砚面打磨平整。讲究的砚台以雕琢、彩绘纹饰来增添美感。最常见的有两种形制：长方形砚板（包括漆木盒嵌石砚）和圆砚（包括三足和无足的）。

长方形砚板最早出现在西周时期，《洛阳市十五年来出土的砚台》一文刊载了洛阳机瓦厂第237号墓出土的一方西周时代的研板（文中称为“长方形石板调色器”），可以说是目前所见的最早的砚板。另外还刊载两件西汉和一件东汉砚板，这些砚板的共同之处就是砚面磨光，背面粗糙，未经磨光。西汉两件的四边向下内敛，呈上大下小之状，其功用一是为了便于手抓，二是为了利于镶嵌（其中的一件出土时外有木盒）。本书图版001“宜官”铭研磨石及研板，其形制与西汉的两件基本一致，研磨石上朱书为标准汉隶，应是西汉时期之物。

漆木盒嵌石砚是两汉时期比较特殊之砚，它比砚板多一个漆盒，还有放置研磨石的槽。西晋初年的文学家、思想家傅玄的《砚赋》曰：“木贵其能软，石美其润坚。加朱漆之胶固，含冲德之清元”就是对这种砚台的赞美，也说明在汉至西晋时期这种漆木盒嵌石的砚台是上层社会非常流行的款式。从出土情况看西汉时期的漆木盒嵌石砚的外盒和砚板都为长方形，如江苏邗江姚庄101号西汉墓出土的漆盒石砚和山东省临沂市金雀山出土的西汉时期漆盒石砚都为长方形，研磨石槽为方形。有些盖上的研磨石槽为圆形，合上以后研磨石不易滑落。因此，漆盒石砚中长方形石砚的基本都是两汉时期的，包括那些没有漆木盒的长方砚板。至三国时期所嵌砚板趋于正方形，图版007漆木盒嵌石砚，砚板近似正方形，石砚四边的木边直立，高于整个砚面，研石槽较深，有别于江西南昌火车站东晋永和八年墓出土的宽边、浅槽漆木嵌石砚，定为三国时期较合适。

三足圆砚也是两汉时期流行的形制，魏繁钦《砚颂》：“钧三趾于夏鼎兮，象辰宿之相扶”说的就是这类砚台。三足的形状主要有蹲熊、兽面、人面等；边缘分有子口和无子口的；整砚分有盖和无盖两种。本书刊载了5件三足圆砚，比对20世纪60年代出版的《砚史资料》刊载的两件有盖三足砚（“汉双鸠盖三足石砚”、“汉三熊足带盖石砚”）和两件无盖、无子口三足砚（“汉兽足石砚”、“西汉圆形三足石砚”），可以明确的是图版003“砂岩石人面纹三足砚”与西汉墓出土的那件基本相符。而图版002“石灰石蟠龙盖三足砚”的高浮雕盘龙装饰与两件有盖三足砚风格相似，为东汉时期的流行款式。这些三足砚应该都是带研磨石的，研磨石的形制大多为上圆下方，西汉早中期也有圆形的，不如上圆下方的便于拿捏，故西汉中期以后很少出现。汉代的研磨石非常注重装饰，本书刊载的三件研磨石各具特色，一件彩绘几何纹样、一件朱书文字和一件高浮雕盘兽纹都颇具时代性和代表性。有盖的三足砚往往在盖中间挖一穹，以便放置研磨石。1983年广州南越王墓出土有三套带研石的石砚，边上有一盒直径1厘米左右凝珠状墨丸（图三），揭开了汉墨的庐山真面目，而研磨石的功用就是将这些墨丸加水研磨成墨汁，结合当时的笔和简，一颗墨丸足可满足一时之需了。东汉时期块墨出现，因此，带砚池的砚台也随之出现。可能是块墨在使用时很难控制用量，故要增设墨池以蓄之。石“大吉祥”铭三熊足砚（图四）带有极具时代性的耳杯状墨池，应该是东汉至三国时期的样式。

六朝时期，纸张逐渐替代了竹木简，无砚池和小砚池已不能满足书写的需要，逐步被淘汰。从文献记载



图三 1983年广州南越王墓出土西汉墨丸



图四 石“大吉祥”铭三熊足砚



图五 青瓷带盖三熊足圆砚



图六 石回环纹八足辟雍砚

看，砚的质地也越来越多样，除传统的石、陶、漆木外，还有铜砚（《文房四谱·杂说》：“魏孝静帝有芝生铜砚”）、铁砚（王子年《拾遗》云：张华造《博物志》成，晋武帝赐青铁砚。此铁于闽国所贡，铸为砚也。）、银砚（魏武《上杂物疏》云：御物有纯银参带台砚一枚，纯银参带圆砚大小各四枚。）、玉砚（《西京杂记》云：以酒为书滴，取其不冰。以玉为砚，亦取其不冰。）等。由于真正的青瓷在东汉中期的浙江上虞一带烧制成功，瓷砚成为六朝时期的一大亮点，主要流行于南方地区。六朝的瓷砚主要是圆形，与汉代的三足圆砚相近。本书刊载三件青瓷砚，具有代表性：第一件沿袭汉代的三熊足，斗笠形盖，砚面有子口，便于扣盖，更重要的是宜于贮放更多的墨汁（图五）；第二件缘更宽，显然不是为了承盖的，熊足外撇；第三件为四足，支烧点靠边，有意让中间隆起，便于舔笔，有向辟雍砚发展的趋势。三件圆砚表现了不同的时代特征，展示了三足圆砚的发展变化，至“石回环纹八足辟雍砚”（图六）为“圆如盘而中隆起”者，已形成辟雍砚，是为南北朝之物。

南北朝时期，北方还流行一种方几形的石砚，如本书图版011彩石鱼纹四足方砚，砚上部两个长方槽，似

为置墨和研石（可能墨丸和块墨同时使用的情况存在），下部圆槽内为砚堂，四边壶门装饰，四足，平底鑿成毛石状。此砚形制特殊，可能与丧葬有关，或为黛砚。

三、发展期——隋唐五代

隋大业三年（607年），影响中国官场1300年的科举考试拉开帷幕，从此中国的众多学子可以通过科举考试，进入统治阶层，光宗耀祖。而唐朝不但要学问好，更是“以字取士”，因此，其间书法家辈出，如“初唐四家”、“颜筋柳骨”等各树一帜的书法名家，使得读书习字成为时尚，促进了文房用具的发展。《歙砚说》记载五代“李后主留意翰墨，用澄心堂纸、李庭邦墨、龙尾砚三者，为天下冠。当时贵之”。砚台作为文房雅具被整个社会所追捧，通过文人墨客的使用对比，对中国砚史产生深远影响的“四大名砚”随即诞生。

四大名砚首推端砚，“世传端州有溪，因曰端溪”。因溪得名端州，所产砚石称端砚。自唐代就开始开采砚石，唐李肇《国史补》：“内丘白瓷瓿，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唐李贺《青花紫砚歌》：“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云”，可见其产量和影响。《端溪砚谱》也记载：“龙岩，盖唐取砚之所”，又云：“龙岩，斧柯山脚谷中石也”。按照各种古砚谱的评说此类坑口不产好砚石，唐代端砚出土很少，石质确实不能代表端砚水平。所谓石质细腻、娇嫩、致密、坚实，更有鸂鶒眼、金线纹、青花、火捺、鱼脑冻等石品而备受文人青睐则是宋以后的事。本书刊载有一青一紫二方端石箕形砚，反映了唐代端砚石质的状况。

歙砚，产于江西婺源龙尾山，又名婺源砚、龙尾砚，因唐时属歙州，故名。宋唐积《歙州砚谱》记载：“婺源砚，在唐开元中，猎人叶氏逐兽至长城里，见叠石如城磊状，莹洁可爱，因携以归，刊粗成砚，温润大于端溪。”出土的唐代歙砚并不多，五代时应是相当流行的，要不南唐李后主也不会评其“为天下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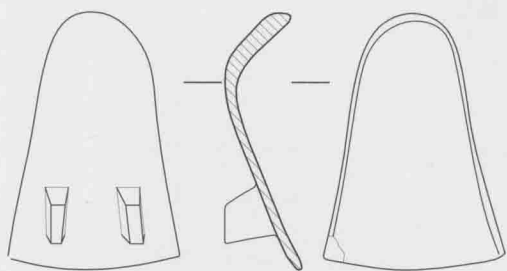
澄泥砚，其实是一种陶砚，由于其精淘细练，击打至坚，比一般的陶砚更坚细，发墨而不渗。宋初苏易简的《文房四谱》对此有较为详细的叙述。唐代澄泥以山西绛州最为著名，出土的实物也相对多一点，本书刊载三件澄泥箕形砚，其细润非一般陶砚可比，这就是为什么要将澄泥砚从一般的陶砚中区分出来的原因。

第四大名砚颇多争议，有说是山东青州红丝石砚，宋米芾的《砚史》有记载，但其评价为“非品之善”，出土的唐砚中也罕有红丝石砚。另一说是甘肃临洮的洮河砚，但也没有唐代洮河砚出土的信息。在所谓“四大名砚”之外有一种虢州石，却是有实物，有记载。虢州石砚，又称稠桑砚、钟馗石砚，唐李匡乂撰《资暇集》记载“始因元和初”，唐杜佑《通典》云：“虢州岁贡砚十枚”；宋初《文房四谱》记载：“今睹岁贡方物中，虢州钟馗石砚二十枚，未知钟馗得号之来由也”。可见虢州石砚始于唐元和初，唐至宋早期均为贡砚，只不过量不大。当优质的端石和歙石在宋代被大量开采出来以后，其声誉渐湮没无闻。本书刊载三件虢州石砚均为唐代典型的箕形砚，石质坚细，红虢州石极似唐代紫端，并且制作规整，确有贡砚之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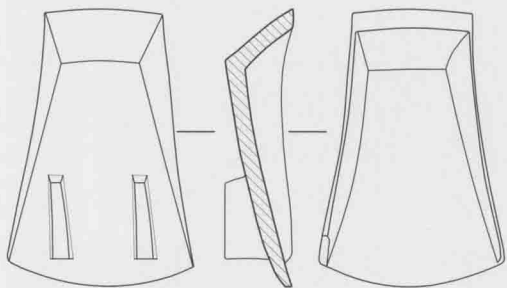
隋唐时期，砚形的最大特点就是砚面储墨量增大，其经典形制有辟雍砚和箕形砚。辟雍砚宋苏易简的描述是“圆如盘而中隆起，水环之者，谓之辟雍砚，亦谓之分题砚”（《文房四谱》“砚谱·二之造”），东晋时已初露端倪，南北朝已完全形成，陕西咸阳北周若干云墓和独孤藏墓出土的五足辟雍砚已是很完备的辟雍砚形制。隋唐之时，辟雍砚成为流行样式，多为带足的圆形，本书安阳窑辟雍砚足多达14个，砚面平坦而低于口沿，为典型的隋代形制（图七）。黑陶三足辟雍砚环状墨池，砚面平而



图七 安阳窑青瓷多足辟雍砚



图八 端石白池箕形砚



图九 紫髯州石有折箕形砚



图一〇 临朐石龟形砚

微隆，略高于口沿，三兽足，为唐代形制。唐代辟雍砚一般足较多，三足是比较个例的样式。五代流行石砚，制成辟雍形制非常费工，基本不见多足辟雍砚。

箕形砚与辟雍砚在唐代似乎是各领风骚，当辟雍砚在中唐时期日渐式微之时，箕形砚却逐渐发展起来。唐代的箕形砚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砚首储墨处如捣臼状，笔者称其为“臼池箕形砚”，以便于区分。米芾《砚史》“样品”条下记载：“又有收得智永砚，头微圆，又类箕象，中亦成臼矣”。智永是唐代的大书法家，每日费墨颇多，此类臼池箕形砚最宜其用了。本书图版025“知柔记”铭箕形砚与安徽合肥唐开成五年（840年）刘玉墓出土的箕形歙砚非常相似，其特点是砚首宽，砚足矮，使得整砚高度都不太高。而其后“端石臼池箕形砚”（图八）的长度几乎与其相等，而整砚高度几为翻番，主要是砚足变得很高，与此相应地砚首略窄变深，储墨更多。此款箕形砚尚有银质的，应是达官贵人所用之物。另一种是有“勒成痕”的箕形砚，笔者称其为“有折箕形砚”（图九）。“紫髯州石有折箕形砚”与安徽巢湖唐会昌二年（842年）伍钧墓出土的紫石箕形砚极为相似，其池底有折痕线，线两端向砚首和砚尾放射两道折痕，如四块砚石拼接之状。此种有折箕形砚对五代箕形砚影响很大，五代箕形砚基本是有折的，但砚首加宽，上翻沿常带装饰，双足降低，重心下移。

唐代还有一种龟形砚，其质地有石、陶、铜等，其形制分有墨池和无墨池的，整砚分有盖和无盖的。石质龟形砚一般为山东临朐所产之石，堂池一体，龟甲为盖，爬行状（图一〇）。陶质和铜质龟形砚多有墨池，以一道弧形梁将堂池分隔。《砚史资料》根据长期研究砚史的人和擅长复制古物的老技工的意见将其

定为汉代，但其后在唐代的墓葬和遗址均有类似的龟形砚出土，从而纠正了对龟形砚断代的错误。

五代除了箕形砚，已经有了抄手砚。1975年江苏邗江蔡庄五代墓出土一方抄手端砚（报告称箕形端砚）；1979年苏州七子山五代墓也出土一方形制相似的抄手砚（报告描述也称“箕形，俗称风字砚”），但砚面前低后高，砚面大于底面，已具宋抄手砚之形。

四、繁荣期——辽宋金

辽金是先后与宋对峙的北方政权，在文化上深受博大精深的中原汉文化的影响，辽代先受大唐文化的影响，而后文人气息浓厚的砚台自然惟宋砚马首是瞻了。辽砚存世不多，所见材质有石、陶、澄泥、水晶、玉等，形制有箕形、抄手形、平首风字形、圆形、方形、秉砚等。2002年11月出版魏占魁的《辽砚》刊载了27方各式砚台，都别具特色。起首的几方三彩圆砚（或八棱形）具有契丹民族的风貌，质地为辽三彩，大多数组合了水洗，砚面周边装饰各种花草纹，砚面形状魏占魁先生称其为“风字形”，虽然此类砚台与宋代的古样风字砚很相似，但砚堂上首菱花形，其灵感应来自于古建筑的壶门，笔者认为称“壶门形”更妥。其中“绿釉人

物动物砚”的砚面倒是真正的风字形，去除装饰就是宋代的“古样风字”砚了。箕形砚是其中第二大品种，共有6方，两方平底，4方有两足。箕形砚是唐代流行样式，辽代在承继唐代样式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唐代箕形砚一般都是斜坡状堂池、两高足、砚首较窄，而辽砚的砚额宽，有的额边呈弧状三边形，并且和圆砚一样装饰花卉纹，本书的多功能砚和平首风字箕形砚都体现了砚额宽、砚边多装饰的特点（图一一、图一二），也为辽时代砚台。魏占魁先生在《辽砚》中称银六棱柄砚是契丹人“在学习汉族文化同时，又融合自己民族特点而加以改造”的，笔者以为这个观点尚有商榷余地。众所周知，辽代墓葬内壁画文化非常发达，工匠用一般的砚台会感觉不便，而柄砚却有诸多便利，图版032、033的两方辽代秉砚（图一三），柄内中空，可以储存墨汁，还可以在秉持的同时温暖墨汁，因此，也许是契丹人发明了柄砚。但宋《端溪砚谱》记载有“八棱角柄秉砚”和“八棱秉砚”，本书有同名实物刊载，砚柄和砚堂并不相通，是否和南方气候温和有关。这种秉砚虽然用宋地的歙石制成，而时至清代蒙古族的木匠工具皮铲还保留八棱秉砚的样子，只是柄为粗细不一的圆形，故契丹人自创秉砚的可能性更大一些。《辽砚》中的鼓砚、抄手砚和随形石砚倒是完全宋朝制式，《端溪砚谱》的形制中有“腰鼓”砚，抄手砚是宋代最大宗的砚形，人们在称呼时往往冠之以年代称“宋抄手”。随形石砚宋代文献称“天研”，据说是苏东坡发明的。《端溪砚谱》在“天研”下面小字注曰：“东坡尝得石，不加斧凿以为砚，后人寻岩石自然平整者效之”。辽代的两方随形石砚还加刻鱼纹，显示了辽文化特色。书中“大同二年”石龙凤纹套砚不仅仅是“陪葬明器”，当为实用暖砚，是实用之器陪葬。

经历了“城头变幻大王旗”的五代十国，宋代皇帝觉得习武之人威胁太大了，而文人最厉害的武器不过是舌头和笔头，既拧不下他的脑袋，也撼动不了他的江山，于是重用文人治国，提倡读书。宋真宗有诗云：“富家不用卖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房不用架高粱，书中自有黄金屋。”明白无误地告诉大家读书谋功名，于是乎全国上下都为“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而奋斗。如此氛围之下，文房四宝之一，与读书人相伴最久、距离最近的砚台，从理论到实践都得到了空前未有的繁荣。首先是此前几乎没有论砚的专门著作，而宋代一下子涌现了多部论砚等的专著，如苏易简的《文房四谱》、米芾的《砚史》、唐积的《歙州砚谱》、无名氏的《端溪砚谱》、赵希鹄的《洞天清禄集》、高似孙的《砚笈》、无名氏的《歙砚说》和《辨歙石说》等，杜绾的《云林石谱》也论及多种砚石。这些论著从宜用的角度对诸多砚石进行品评，首先提出了石品这个概念，以石品的优劣来评判砚石的等级。米芾《砚史》中的一段话很能代表宋人对砚台审美意趣，“夫如是，则石理发墨为上；色次之；形制工拙又其次；文藻缘饰虽天然



图一一 青石山铭多功能砚



图一二 石阶梯边平首风字箕形砚



图一三 澄泥鱼形秉砚

失砚之用。”以此而论，虽然《砚史》中列举的砚材有23种之多，但最发墨宜用的主要为歙石、端石、洮河石、澄泥。

歙砚，被南唐李后主评为“天下冠”，据《歙砚说》云“李氏亡而石不出”，到北宋景祐时校理钱仙芝守歙，改大溪流经之道，始得佳石。“其后县人病其需索，复溪流如初，石乃中绝”。“后邑官复改溪流遵钱公故道，而后所得尽佳石也，遂与端石并行”。宋代是歙石的黄金时期，其声誉甚至超过了端石，南宋赵希鹄《洞天清禄集》感叹说“世人论砚者皆曰多用歙石，盖不知有端。”其中的缘故皆因两宋时期最上品的歙石全被开采出来了，其光芒盖过了石品尚未完全表现的端石。《歙砚说》列举了优质石品31种，其中眉子9品，罗纹12品，水纹金纹10种，可谓是琳琅满目，宋以后再也没有见如此众多的歙石佳品了。本书收录的上品歙砚有15种之多，有被称为“砚之奇材”的细罗纹；仅次于细罗纹的刷丝罗纹；纹路奇特的算条罗纹；豪华典雅的金晕鳝肚眉子；莹润细腻的枣心眉子等，36方质地各异的歙石，展现了两宋时期的歙砚风采。

端石采自唐代，唐代的龙岩坑石色深紫，几无石品可言。宋代端石分坑口、石品。《端溪砚谱》将端石分为下岩、中岩、龙岩、半边山岩、蚌坑等，其中以下岩水口石为上，清代文献称水岩，为陈公密所开，其石色“紫如新嫩肝”，有眼正圆、五色晕十数重、具瞳子。这是宋代最上品的端石了。《端溪砚谱》认为“石有眼则易分品第”，以青眼为上，黄赤为下，以圆正、色晕、瞳子将眼分成鸛眼、鸚哥眼、了哥眼、雀眼、鸡眼、猫眼、菉豆眼等，根据方位又分成高眼和低眼，有些端石眼多，在抄手上镂雕石柱以保留，排列如星斗。《端溪砚谱》将“火黯（即明清时期的火捺石品）”列为石病，又注曰“唯火黯端人不以为病，盖崑石必有之，他山石皆无。”本书刊载宋端20多方，有各种石眼、火捺、青花和翠斑等石品，可窥大繁荣时期宋端面貌之一斑。

洮河砚是宋代又一种比较名贵宜用的砚台，南宋赵希鹄《洞天清禄集》在论述端歙石后说：“除端、歙

二石外，唯洮河绿石北方最贵重，绿如蓝，润如玉，发墨不减端溪下岩，然石在临洮大河深水之底，非人力所致，得之为无价之宝者”。宋洮河石一般都为偏黄的秋葵绿色，质地细润，发墨不渗，有些带缠丝石纹，今人称之为“绿漪石”，可谓是美观适用。洮河石得之不易，存世量较少，本书刊载两方半宋洮河砚，半方就是047图“紫端嵌洮河石镶式砚”的镶嵌砚板，将最主要的砚堂镶嵌宝贵的洮河石。另一方只履砚即为稀有的洮河绿漪石（图一四）。



图一四 洮河石只履砚

好石头都是水养的，石砚产区基本在雨水丰沛的南方，因此北方多地都以生产澄泥砚为主。如大名、相州、泽州、虢州、柘沟等均均为北方澄泥砚生产地。大名、相州以仿铜雀台瓦砚著称，《文房四谱》记载：“今之大名、相州等处，土人有假作古瓦之状砚，以市于人者甚众”；泽州产品为吕砚，《砚史》中的“吕砚：泽州有吕道人陶砚”，《砚史资料》图版24刊有“泽州吕砚”铭只履陶砚；虢州生产虢州法造陶砚，《砚史资料》图版17载有“虢州法造润金砚子”铭抄手陶砚；柘沟位于山东柘沟镇，《砚史资料》图版18、22载有“东鲁柘砚”、“柘沟石砚”铭的抄手陶砚，可能是质地比较坚细，铭文自称石砚。本书刊载辽澄泥砚两方，宋澄泥砚四方，金代一方，以楠木盒紫澄泥淌池砚最为精美（图一五），也是宋代澄泥之极品，粗看极似紫端，放大镜下能看到细小均匀的绢云母，应是澄泥质地，产地尚不明确。



图一五 澄泥淌池砚及毛笔、楠木盒一套